

西北边疆文化与文学景观学术研讨会参会报道

曾小月
(汕头大学文学院)

2018年7月20至26日,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主办的“西北边疆文化与文学景观学术研讨会”在新疆伊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60多位文学地理学学者出席了会议,本人有幸也参加了此次盛会。整个会议由五个专题组成,分别是“西北草原文化与文学景观的形成”、“伊犁将军府文人集团与边疆文学景观的形成”、“清代流人文化与西北边疆景观的书写”、“新疆伊犁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多样化的文学景观”,以及“西北边疆文化与文学景观研究”。与会专家、学者就文学地理学前沿问题、西北边疆文化与文学创作等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以下是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

“全球化空间”与“文学的地域性”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全球化空间的出现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构成了某些挑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需要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言之。文学活动包括三个阶段:文学创作、文学扩散(传播)、文学接受。具体来讲,全球化空间的出现对文学创作并未构成大的挑战。因为全球化空间只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无论新、旧都只能是从属于自然空间(即地理空间),不可能对应于自然空间,更不可能消灭自然空间。正如冯雷在《解读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一书中所言:“自然时空不是借助于社会时空才得以成立的,相反,社会时空是依赖于自然时空才得以成立的。”每个作家都携带着他在自己熟稔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地理基因,无论他在什么样的社会空间写作,这种地理基因都会由于相应的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对他的作品构成一定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全球化空间出现的背景之下,许多作品的地域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因此,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将会长期存在,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将会长期存在,“人地关系”作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立论前提不会动摇。但是,全球化社会空间的文学地域性与传统社会空间的文学地域性还是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环境是否有了变化,而在于作家的视野有了变化,读者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这就要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必须面对全球化空间出现的现实,发现和解答新的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体系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构成了一

个概念体系，它们是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针对作品研究的，如地理影像、地理意象、文学景观、地理空间、地理叙事等；二是针对作家研究的，如地理意识、地理基因、地理根系、地理思维、地理感知、地理经验、地理认同等；三是针对文学传播的，如文学扩散、文学迁移、文学中心、文学源地、文学区等；四是针对文学的地域分异的，如地方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地理文学与非地理文学、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等；五是针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如文学地理学批评、从文本出发、以人为中心、时空并重、环境干预等。相信再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体系将更加充实、完备与科学。个人认为：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就是三个关系，即人地关系、文地关系、神地关系，对于这三个关系的阐释，关系到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生存基础。传统的地理学只讲人地关系，文学地理学讲文地关系，今后可能要讲神地关系，甚至可能三者并重。

潮汕图景：泰华散文中的地理叙事

曾小月（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泰国的华人作家中，潮汕籍占了 80%。无论是他们日常的文化生活还是作家写作中，具有浓厚的潮汕文化特质。在泰华潮人散文中，作家试图突破了时空限制，从地域环境、传统民俗中反思现实社会，使得作品中的“潮汕图景”非常突出。泰华散文中的潮汕图景，指作品中以潮汕地区自然地理、人文风貌为核心的文学描摹与艺术想象。作家们着力于对地理因素的书写，企图借用时空转换、地理符号的写作策略，构筑起泰国潮人关于故乡与异乡、传统与当下等命题的个性思考。

首先，归纳了泰华散文中的潮汕地理影像，如以韩江、芒果树、潮州功夫茶以及红木屐为代表的潮汕地理意象。其次，展现了极富地方文化内涵的地理景观，如韩文公祠、潮州牌坊、湘子桥、老屋等。第三，挖掘出泰华散文中的审美意蕴，即依托故乡风物描摹人物性格，借助时空差异渲染作品主题。最后，探寻泰华散文的潮汕地理根源，主要在于泰华潮人作家追求自适生存状态，以及身居异国对母国文化的传承与反思。

泰华散文中的潮汕地理叙事，是一个具体、真实而又生动的泰国潮侨移民生活写照。作家通过家乡小食、故里人事、潮汕景致，倾吐了恋土爱国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泰华散文中，呈现出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潮汕、泰国两个并置地理，作品之艺术张力也就更显立体和丰富。

“边缘”与“中心”之互动

田峰（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

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提出了“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点。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讲，也是这样。要想深入研究“中心”文学景观，必须观照“边缘”文学景观。西域作为“边缘”的典型，从先秦纳入到文学书写后，一直未曾中辍，历代文学家对西域的书写与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夷夏观相一致，成了藩辅“中心”的西北屏障。正因为如此，西域在文人的地理感知中多为荒凉、阔远，文学景观壮美雄奇。但是随着历代疆域的变迁与文学家身份的变化，文人对西域的地理感知也不尽相同，如唐代亲旅西域的岑参对西域的地理感知是壮美的，元代契丹诗人耶律楚材对西域的地理感知中又多了一份秀美，清代的纪昀、洪亮吉、施补华、萧雄、邓廷桢、宋伯鲁等人则在清朝疆域扩展的大背景下对西域的地理文化书写显得更为理性。这些诗人对西域的地理感知皆避不开两个重要问题：疆域（地理）与夷夏观（文化），他们的作品中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献中地理观念与文化观念之“惯性”思维。在文学研究中，深刻把握“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张力，从“边缘”发现“中心”，从“中心”洞察“边缘”，我们才能走出“惯性”，对“边缘”文学景观有新的认识。

边塞诗研究应注重对文学景观的考察

高建新（内蒙古大学文学院教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传统的边塞诗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再往前走，就必须借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加强对文学景观的考察与研究。文学景观是指分布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经过文学家题咏之后所形成的景观，多以实体的形式呈现。对文学景观的研究既要重视文献材料，又要重视田野调查，从而避免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不足。以王维《使至塞上》为例，传统上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解释为“黄河”，但是据诗题和第二句来看，此诗实写于居延塞上。居延塞在今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境内，这里有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与长达250公里的额济纳河。既然写在居延塞上，“长河”就不可能是黄河，因为黄河在祁连山外、青海湖之西南，距离居延塞有千余公里之遥，诗人身在居延塞上，是不可能看到黄河的。这首诗写的是眼前实景，而非想象中的虚景，诗人身在居延塞上，所面对的正是流入巴丹吉林沙漠中的额济纳河（古称“弱水”），他在此建构了一处令人惊叹的文学景观：在浩瀚无际的金色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映衬下，一柱燧火青烟悠悠直上，报告着边境的平安；奔流远去的额济纳河（“弱水”）天水相接处，是冉冉下落的浑圆的太阳。如果不亲临巴丹吉林沙漠与额济纳河，不去实地考察古居延的自然地理环境，就不能正确解释此诗以及诗中所建构的文学景观。再如唐代边塞诗中大量描写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陇头、阳关、玉门关、青海湖、金河、五原等等，如果不做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不在一定的

地理空间中加以观照，所获得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和细究。

新疆的“呈现”与“创造”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新疆之大之美之神奇，是她给世人的直观印象，更是文学家的妙笔生花般的“创造”。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就是说，文学不是地域生活的平面镜，它更是一面多棱镜、甚至是美容镜。当代众多民族作家都参与了对新疆的呈现与“创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别于内地文学翻身解放、生产建设的宏大叙事，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歌咏着少数民族的生活与爱情，而在碧野的笔下则是辽阔壮美的天山景物。在七十年代，王蒙独书多民族融合的“这边风景”。在新时期，杨牧、周涛、沈苇等诗人“创造性地把中国当代人的思考溶解于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中，他们使那些粗犷的、强悍的、坚韧的、乃至荒凉的、悲慨的一切，无不洋溢着当代人新的渴求和吁求”（谢冕语）。刘亮程等的散文是本土居住者的素朴雄浑的歌吟。而董立勃、红柯等的小说更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的立体的新疆。红柯呈现的是浪漫的、有血性的、有灵性的新疆，他探寻新疆地域风貌与男人的野性和激情关系，以强悍的自然意象显现生命活力，表现了爱情至上的游牧民族的精神气质。对汉民族的以家国天下为主旋律的文化而言，这是一种异质性的个人幸福价值观，他的呈现带着理想的浪漫的“虚构”，然而也令人神往。

此次学术会议紧扣西北边疆地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主题，观点新颖，视角独特，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与文学批评的发展。我们相信，下一届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将会更为丰富与精彩！